

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研究

生态文明理论探析

姚介厚

【提要】生态与环境历来是多样文明的基础构成要素。中国提出、阐发生态文明,是从文明理论高度将维护、发展生态视为社会整体文明全局进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文明理论的创新。当代生态文明和社会整体文明紧密关联,内涵开阔丰富,对当今世界有普遍性意义:(1)它的首要涵义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2)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前提,本身就是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3)它和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互相联结、渗透,形成其多重子要素,促使社会整体文明良性发展;它的伦理基础应是整体论的基本价值,即人与社会系统整体和生态系统整体和谐、协调与平衡。(4)为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全球生态文明,需履行生态文明交往伦理的三条基本准则,即生态责任准则,互相包容准则,互相合作准则。

【关键词】文明理论 生态文明与社会整体文明 可持续发展 制度文明与生态伦理 生态文明交往伦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4-0005-08

当今世界日益密切的全球性交往,又呈现文明、文化与发展的多样性。然而,严峻的生态形势已成为一大全球性风险难题,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必须直面应对其严重挑战。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振聋发聩,提出环境污染之重大问题;罗马俱乐部来自全球100多名学者1972年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强调除非人类自觉控制人口、限制耗损环境,否则将无法避免地球资源耗竭、生态破坏的悲剧;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则是全面论述和平、发展与环境内在联系的纲领性文件;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更进而揭明解决生态问题才

能保障可持续发展、全球共生共荣。半个世纪来国际社会与学术界普遍关注、重视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一焦点问题。国外有声势浩大的绿色运动,有多种分歧颇大的生态学说与流派。中国学术界研究生态哲学、环境伦理、生态经济与产业也由来已久,专著、论文愈益增多。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2012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更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八大已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

“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又一重大创新，是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反思以往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不足、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贡献。中国率先从文明发展的理论高度提出、阐明“生态文明”范畴，并将建设生态文明列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从不同学科角度对“生态文明”理论的探讨很多，有不同见解；国外历年来研讨环境哲学、生态伦理的不少，而专论“生态文明”的尚少。所以，需要紧密联系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实践，确切理解与阐发“生态文明”这一文明理论的基本范畴，它有着体现其普遍本质、开阔而深刻的内涵。本文仅从文明理论的视角探究这一主题，揭明“生态文明”是社会整体文明的一大有机组成部分，关涉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澄析“生态文明”范畴对全球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涵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生态与环境历来是多样 文明的基础构成要素

地球作为人类的“母亲”已有40多亿岁，人的存在则才200多万年，可谓地球晚产的生命体，而人类文明更不过约5000多年。所谓旧石器、新石器时代即有“原始文明”的说法并不确切。人类历经漫长的野蛮与蒙昧时期，到了有金属生产工具、得以拥有较大能力利用、改造自然，和自然发生较大幅度的物质与能量变换，从而能用剩余生产成果组织劳动、开发自然，社会组织上出现了阶级与国家之后，才进入文明社会，而文明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演变、更迭又紧密关联。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

“文明”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而基本倾向是将它归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其实，历史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文明是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是在历史发展中多重文明要素，特别是生态环境、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基本文化精神互相渗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综合实体，是一种长时段（以世纪为单位）的深层历史结构与文化综合，表现为人和社会整体的运行、进步与发展状态。在出现文明前的原始社会早就有简单、素朴的文化，而产生文明后之广义的文化综合（人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则表现了文明的具体内涵，狭义的精神文化作为文明的精神形态则体现时代精神。世界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生长绵延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在跨文化交往中又实现动态的同一性，即互相融会与学习，共同丰富与发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史的主流。

生态（Eco-）一词源于希腊文，指“家园”、“环境”，19世纪中叶以来它主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地球就是人类赖以生长的家园。生态本质上体现文明进程中人和自然的交互作用关系。人自身直接地就是自然的存在物，既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之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又是受自然制约、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对自然有两重性，人对自然的对象化活动既是能动的，又是受自然对象制约的。人通过合理的物质生产活动将自然纳入文明进程，改造出“人化的自然界”，在不同社会形态中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对立统一关系，努力使其和解、融为一体。这种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是文明进步的基础要素。当然，这种基础要素和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社会要素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与制约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 到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来高级的文明形态，如马克思预言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可望人同自然界完成本质的统一，“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①那就是马克思指出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可见，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生态始终就是社会整体文明的基本要素，是其甚为重要的有机构成部分。当代的文明理论家对此也有反思。

现代英国研究文明形态史论的著名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历史研究》中就认为：文明社会有别于原始社会，文明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社会整体”，是“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即环境、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相互联结、相互依赖所构成的一个整体。他破除西方中心论，认为文明的产生与演进是多元、多线的，确认历史上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研究了5000多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明。^②在论述文明起源与动态发展中，他既批判“种族论”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又用中国古代哲学中“阴”和“阳”范畴的转化，详论了文明起源于人和自然环境、人为环境的对立面互相作用，名之为“挑战与应战”，主张一种“卓越出自艰辛”的“逆境生成”说。他以大量历史事实论述，世界上第一代文明主要生成自远祖人以巨大创造力应对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确认文明是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环境中所创造，人则是文明生成、演进的基本自决力所在。^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探察、展望受考验的当代世界文明，作为和平主义与雏形的世界主义思想家、提出与研究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先驱，较早就指出生态灾难在威胁世界文明与人类生存。他探究的当今全球性现实问题，首要的就是破坏人类安身立命的“生物圈”，造成环境与生态危机。“生物圈”至今是人类唯一栖身之地。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贪欲心驱使，已造成各种大量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而作为文明冲突的战争更使之加剧，“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

类自我灭亡的程度”。“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何去何从，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④他已蕴有生态伦理思想，认为在整个生物圈和人类中，“善恶分别呈现为和谐和冲突的形式。我们感觉到的和谐是确定无疑的善，而冲突是明明白白的恶”。^⑤他主张必须以合理的伦理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是现当代法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建树了总体史、长时段的文明理论。他指出在德国语言使用中文明仅被赋予“有关人的物质生活的含义”，批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⑥等德国现代社会学家以为“‘文明’不过是大量的实用性技术知识、一系列应对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②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46页。

③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修订本），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他具体描述四五千年前最早发生的文明中，苏美尔文明生发于其祖先在干旱过程中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森林沼泽地方拼命斗争。抵御、驯服尼罗河下游洪水泛滥等严峻自然，造就了古埃及文明。赫梯文明生于安那托利亚高原的挑战。古代中国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而非安逸而易于为生的南方长江流域，正是因为这里人类要应对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外，还有酷热、严寒等气候变换的灾害，中华祖先却将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的摇篮。马雅文明的挑战是大量的热带森林。安第斯文明的祖先们应对的挑战是高原的严寒气候、荒瘠土地和海岸上赤道沙漠地带。古代希腊文明起源自应对海洋和贫瘠山地的挑战。古代印度文明则在应对潮湿的恒河流域和热带森林之挑战中生成。

④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页；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5页。

⑤ 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⑥ 马克斯·韦伯的弟弟，现当代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有《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等名著。

然的方式”。^①他强调文明的复数性即多元性与多样性,指出近现代西方输出的“工业文明”仅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世界接受它也并非“接纳西方文明之整体”。^②他认为文明是社会总体、长时段的历史实体,有多种涵义,有四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构成部分。一是地理区域,即文明立足自身的地理环境。不仅指纯自然环境,更指世代无数人力不断累积的劳作改变了地貌,也使“人类自身的生产”得到改变。人在特定地理空间和气候、植物、动物等等自然要素的互相作用,是文明的应有之义。人类正是在利用有利自然条件、机遇并多少受其限制中,兴起、发展了文明。古代世界生发、繁荣的许多“大河文明”和“海生的文明”,正是在利用、改造并受限制于多种地理条件中,形成色彩斑斓的世界和各种生活方式。通过河海、草原、沙漠等对外贸易并接受外来激励作用而得到丰富。^③每种坐落于特定地理环境的文明还表现为一个“文化带”(aire culturelle),即一组文化特征占优势地位的地区。^④他说的地理区域包括了人化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二是社会整体,即特定社会总体的状况、张力或进步与发展,文明犹如镜子折射出长时段的深层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构成,表现为社会制度。三是经济状态。每种社会的文明都依赖于经济、技术、生态、人口等方面的物质环境,其增减与盛衰会深刻影响社会结构与文化。四是集体心态。心态(mentality)指精神禀赋、意识状态,世界观是其核心。每个社会的特定时期,都有一种确定的世界观与集体心态支配社会大众,引导社会选择,指导社会行动。布罗代尔综括上述文明的开阔内涵,揭示文明的普遍本质特征:文明是由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经济状态、集体心态等互相联结之多重要素所综合的一种长时段的结构与实在,有长期的历史连续性,其精髓是可代代传承的最为珍贵的遗产。

由上述可见,维护、发展生态历来是构成各种文明的基础要素,做得好的,有利于文明的繁荣与兴盛;做得坏的,会致使文明衰落乃至湮灭,历史上不乏因滥伐森林、土地沙漠化

而失落了的文明。^⑤生态问题贯穿在人类多样文明的演进史中,并非如今突现的。但当今世界确实显现出史无前例、相当严峻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促使人们对生态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反思、深化认识。

二、当代生态文明和社会整体文明的紧密关系

当代世界生态危机顿现的一大成因,是近代以来西方传统的工业文明及其流播各地,既造就巨大生产力的进步,也使人们在特殊利益驱动和错误哲学理念指导下,有巨大能力扭曲、破坏和自然之正常的物质与能量变换关系,猛超生态系统承载力,造成各种环境污染与灾难、能源匮乏与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森林退化、臭氧层破坏乃至环抱地球的大气层发生温室效应,威胁人类生存。严峻的环境危机促使人们反思生态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提出、阐发“生态文明”范畴,就是不限于环保科技与经济、伦理等局部层面,而从科学发展观与文明理论的高度,将维护、发展生态视为关涉社会整体文明全局进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以求开拓关系全民福祉、代际公平永续、民族伟大复兴的长时段中华文明新历史进程,赋予它全面、开阔、丰富的内涵。这不仅是一种生态自觉意识的升华,也是一种文明理论的创新,对深化研究文明史与文明理论自有意义,对当今世界多样性的生态文明也

① 参见[法]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6页。

② 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页。

③ “大河文明”如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等;“海生的文明”如腓尼基、希腊、罗马文明等均均为地中海之女。

④ 参见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3页。

⑤ 如农业文明时代随着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作用的加强,也引发了一些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等生态环境问题,这一时期我国西部地区的罗布泊和与它相邻的楼兰古城相继消失。

皆有普遍适用意义。生态状况本是各种文明固有的内在环节，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及相关的社会和谐为目标的当代生态文明，自有崭新内涵。

不过，或曰当代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形态、标志一个新时代，这种见解似乎缺乏文明理论和社会现实的根据。就以主要生产形式来划分文明而言，当今人类尚未走出工业化之路，并未超越工业文明。如布罗代尔所言，近现代西方输出的“工业文明”仅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不同社会整体的多样文明，则可创造多样的“工业文明”特征。当代生态文明确实是要超越、克服传统工业文明与现代性的弊端与负面效应，创新工业文明，实现多元的新现代性。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提出，西方世界也要批判传统现代性、重建防止全球性生态风险和其他社会弊端的第二次现代性社会，或曰反思的现代性社会。高扬当代生态文明，无疑有利于更新社会整体文明、促进全球文明的多样性进展，有利于世界文明共同进步。

当代生态文明和社会整体文明的关系表现出新特征，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代生态文明和社会整体文明不是简单的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生态文明贯穿、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社会整体文明中居于突出地位。生态文明的内涵也因而开阔丰富，和社会整体文明的诸多部分或要素交叉关联，它自身就又包括了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生态产业、生态科技、生态教育、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生态消费与生活方式等等基本子要素，在社会文明的各领域、各层面皆可见其深刻作用，关涉社会的整个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所以，当今中国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重要发展战略部署。生态文明建设关涉当今中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关系全民福祉、民族伟大复兴、代际公平永续的长时段新历史进程。

当代生态文明，由于高新科技重大发展，

在错综复杂的诸多社会要素制约中，又表现为人和自然超乎往昔的、幅度巨大的物质与能量变换关系，这就有“双刃剑”的两重性。生态文明建设得好，就能克服生态风险，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以及相应的社会和谐，就能造就巨大的生产力，促成社会整体文明的巨大进步。生态问题处理不好，人所掌握的科技手段这种利用、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就会在特殊社会条件下非但不能解决生态问题，反而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使社会整体文明严重倒退，甚至使人和文明自身有危亡之虞。

犹如世界诸多文明有多样性与同一性一样，世界各国、各地区作为社会整体文明之有机构成部分的诸多生态文明，也是既有多多样性，也有动态的同一性。其多样性指各国、各地区的生态文明会因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与社会条件而有特殊性，包括特殊的生态问题成因、治理目标和途径等等。其动态的同一性则有双重涵义：一是诸多国家、地区的生态文明都具有生态文明之普遍的基本内涵，这种普遍性使诸多生态文明在目标、治理、建设中相对更易融会、沟通。二是它们在全球化情势下、面对全球性的生态风险，开展生态文明间的跨文化交往，互相借鉴与吸纳，存异而求同，求得世界多样文明共同进步。

当代的诸多生态灾害、环境危机及潜在的生态风险皆无国界，而是全球性问题，非一国之力、在某一社会整体文明之内所能克服，迫切需要多样的社会整体文明以开放心态、面向全球，加强生态问题上的合理交往，也促成世界上多样生态文明之间的直接交往。在这种互补的交往中，协同、合力抵御全球性的生态风险，解决全球性生态难题；同时，努力创造一种全球的生态文明，保障全球的生态安全，切实有效地促进当今世界多样文明的共同繁荣与进步。

三、当代生态文明的普遍涵义

“生态文明”范畴对当今世界多样文明有普遍的可适用性，也正在被诸多国家的学界所接受。多样生态文明的同一性，亦即从宏观大处

把握生态文明范畴中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涵义，可以概述为以下四点。

第一，当今生态文明首要的普遍涵义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人应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利用、优化自然中，消除、克服生态危机的威胁，求得自然生态系统整体和人自身构成的社会系统整体动态的协调、平衡与发展。这种生态文明可谓当今世界各种文明皆应有的基础性有机组成部分，有普遍适用意义。要不然，严峻的生态灾难与危机，会损毁作为社会整体的文明，甚至导致人自身与社会文明不复存在。发达国家较早显露两次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生态弊端与负面环境效应，也较早开始局部地治理环境问题，而当代西方的生态现代化理论等其实也已从上述生态文明首要涵义的高度，批判西方传统的现代性，谋求生态现代化良性发展以实现所谓第二次现代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各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与当今发展特色，在必然要经历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路中，已遇到不少严重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也已刻不容缓，要避免因袭发达国家的生态问题和发生新的生态危机，就要根据自身国情，高扬生态文明旗帜，走出新型的工业化、城市化之路，实现自有特色的、多元的现代性。

第二，文明本是表征社会整体发展状态之长时段的历史实体，当代生态文明则更和可持续发展内在紧密关联，是后者的先决前提，可以说它就是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发展理论经历了如下演变过程。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较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奉行将发展等同于单线经济增长、即GDP增量的理论，其代表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以此为指导，不少国家造成环境恶化、社会畸变乃至动荡、瓦解的后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70年代末召开关于发展观的会议，批判了这种片面混同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观念，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综合、内生的发展理论，具体表现在法国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受

UNESCO委托所写的《新发展观》一书中。它强调社会整体内生的、包括文化等要素的全面发展，当时受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论影响，也已注意分析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环境污染、资源耗竭间的关系。而正是在环境与生态危机愈益成为全球性问题、发展困境的现实条件下，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公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界定：“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含两个重要概念“需要”和“限制”，要求人类生存方式同地球承受能力相适应。可持续发展关涉社会整体的多方面如经济、科技、人口等，但全面渗透并系统地统摄它们的是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它也强调人自身良好的再生产和长时段的代际公平，当代人必须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地球。当今中国提出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推进社会整体文明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一深蕴生态意境的奋斗目标。

第三，生态文明和社会整体文明的其他有机组成部分互相联结、渗透，形成其多重要素，展示其丰富内涵，促使各具特色的社会整体文明依循良性生态之路可持续发展。物质文明体现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是整个文明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贯穿其中，就要求转变生产与生活形式，发展生态产业，造就的生态经济系统由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等的综合效益，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推进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以生态科技为发展经济的驱动力量，并从浪费型、环境损害型消费模式转向节约型、环境保护型消费模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创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文明，并为全球文明的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制度文明是整个文明的社会结构之关键所在，至为重要，也是形成生态文明框架结构、规约其行为实践的根本保障。两者的贯通就是建立、完善生态制度，即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法

律、政策和体制机制，包括生态战略规划制度和将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环境保护与监督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切实依靠制度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则体现一种社会文明的人文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表现为各种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也是互为贯通的。在生态教育中促成民众的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各种生态文化，自然可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社会风尚。而直接渗透、制约生态文明的关键要素是生态伦理，它是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和基本价值取向，既为各种生态制度提供伦理根据，也为各种涉及生态的行为提供规范与评价的准则。现今国内外研究生态伦理的学说不少，见解不同，颇有争议，大体有生态中心论（包括深层生态学），人类中心论（包括生态现代化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三种，自可继续深化研讨，这里不展开论评。对他们各自论及生态伦理所包涵的合理成分，似可统摄、吸取。但就生态文明总体而言，其伦理基础应具有普遍性、整体性，综合进入文明范围而皆有伦理价值的自然和人、社会。概言之，生态文明之普遍性伦理基础，是一种适用于各种社会整体文明的、整体论的基本价值，那就是人与社会系统整体和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整体和谐协调、共生共荣。

第四，世界上各种生态文明如同社会整体文明，历来不能自身封闭、孤立生成与发展，当今必定要在不同文明之和平合理、包容互补的跨文化交往中，互相融会与学习，不断丰富与充实，以求协力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推进全球生态文明。这也表现了生态文明多样性中的动态的同一性。生态问题往往无国界，是跨地区、跨文化的，已成了当今国际社会甚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各种文明双边或多边交往的重大主题。这种全球性生态文明交往作为一种特定的行为需要伦理规范，应确认可适用于各地区、领域、类型的生态文明交往的伦理原则，以利于加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这种生态文明交往伦理的具体内涵有待拓展探究，而有三条最基本的生态文明交往伦理准则应予肯定。一是生态责任准则。就是说，当今

各国与社会群体对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净化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基础，皆有不可推卸或转嫁的责任。担当这种责任并不容易，因为它往往关涉多重、复杂的利益。如当今国际上关于气候问题的会议与谈判已有多次，但举步维艰、进展甚缓。所以，生态文明交往中实践生态责任准则，要借鉴经济伦理中的利益相关者原则，充分尊重、合理兼顾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权益，摒弃不道德的转嫁环境污染行为，也要消除“绿色壁垒”的设置；同时要秉持历史主义态度看待生态责任，如应对气候问题的温室气体减排，确认不同国家承担“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有自身的发展权、环境权，建立符合自身利益诉求、自有特色的生态文明。这也是全球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二是互相包容准则。包容是一种交往的美德，指相互承认、容纳差异性，包容“他者”，便是丰富“自我”，同时也指不强加“他者”所不能接受的成分，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黄金规则。生态文明交往秉持互相包容准则，才能互相理解、平等对话，并以积极态度借鉴、吸收、包纳“他者”之长处与先进经验，促使全球不同生态文明互利共赢、共生共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20 世纪 60 年代即开始针对大气污染等多方面环境治理，在建立有关生态法规等举措上也有好经验、好成效，中国应可从中借鉴、学习。三是互相合作准则。这不仅指双边或多边生态文明交往行为互相协调、配合，能动、和谐地互动互渗，通过对话式的理性论证与协商，求同存异，获求共识，来解决不同国家在生态领域的分歧、摩擦与矛盾，达到区域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同时，这更指当今生态与环境危机是全球性问题，为了人类整体的生存与发展，为了长时段的人类社会整体文明永续不衰、福泽子孙后代，当今世界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国际合作，切实地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勤勤

A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ao Jiehou

Abstract: Th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are always 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s an innovation of civilization theory, in which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ecology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and organic constitutive part in the whole progress situation of social civilization. Being closely related with social integration civilization, th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its broad and abundant connotation, and it embodies the universal meaning as following four points: 1) Its primary connotation consists i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 nature, and their common growth & prosperity. 2) It is the prerequisi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self is the civilization aiming at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In mutual coupling & penetrating with material civilization, system civilization &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ms its multiple sub-elements to promote benign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Its ethical basis should be a sort of basic value of holism, which is a harmony,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of the integration among human, social system and ecological system. 4) In order to reinfor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us advance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ee basic guide lines for communication ethic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cluding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obligation, mutual inclusiveness and cooperation are needed.

Key words: civilization the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ethics; communication ethic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观点选萃

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要增强回应性

姚德超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姚德超在来稿中指出:

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与公民参与的新发展,对地方政府公共决策回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系统要增强回应性,必须加强民意跟踪监测,这是优化决策回应机制的基石。首先,在人事安排上,要配备专门信息员,建立健全决策信息收集制度。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民意常常以社区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形式得以即时陈述和表达,这既增加了信息的容量及其复杂性,也增加了公共决策系统收集政策信息的难度。因此,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面向公众的决策信息收集制度,对于全面准确地掌握民意就显得十分重要。其次,要通过定期与不定期跟踪监测,及时了解民意变化,为政策调整而采取的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政策调整也是顺应民意的反应,而民意发展变化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新媒体进行跟踪观察。最后,要通过政务门户网站、政务博客乃至官员私人微博等形式,及时回复公民意见与要求。此外,政府决策系统在“输入”民意之后,还需要在有限的信息处理与转换时间内,通过一定的方式“输出”反应或反馈,公布对某些政策问题或公共管理实务的处置意见或态度,随时发布决策信息。显然,新媒体不仅为地方政府收集政策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地方政府的诸多回应性“输出”提供了有效方式。

(周勤勤 摘编)